

本土化践行：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根本路径

周忠华

摘要：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必须以现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机制。本土化践行是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根本路径。

关键词：生态文明；本土化践行；效度提升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4)01-0071-04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生态问题不断突显，生态伦理责任担当又显存认识分歧的今天，如何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我们认为：本土化践行是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根本路径。这里的“本土化践行”是指，人民群众以现时条件为转移，立足于本土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机制，建设符合本土情境的生态文明。它有四层内涵：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支撑，体现在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机制；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场域规范，体现在立足本土，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本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接；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定位，体现在建设生态文明应以现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要求，体现在人民群众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场域规范、历史定位与主体要求统一于实践支撑中。

一、本土化：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场域规范

本土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一个空间范围，即在本土的场域内建设，这一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立足于本土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又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本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接。

本土化既包括观念层面上的本土化，又包括实践层面上的本土化。从观念层面上来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区域，都有自己特殊的生态问题，不可能直接用一般性原则移植于本土来解决特殊问题，也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来解决本土的生态问题，而只能以一般性原则为指导，以本土的生态问题为中心，把生态文明观一般性原则与本土生态实际相结合，使生态文明观本土化。否则，生态文明建设难以实现。从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生态文明观一般性原则“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P742-743)}。一般性原则只有同本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改造世界的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P35)}生态文明观基本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是同本土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是在本土化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

就中国而言，生态文明观必须同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其根本要求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生态问题，形成中国化的生态文明观，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移自外域”的理论“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3](P534)}，从而向中国人“靠拢”，成为中国人民认识与改造生态环境的思想武器。因为，从“生态文明”与“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西部开发中环境问题研究”(10XZX0010)

作者简介：周忠华，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湖南 吉首 416000)

的关系维度来看，西方生态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都不能直接拿来“对接”并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就西方生态主义来说，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以“环境”遮蔽“发展”，甚至成为“生态极权主义”或“环境法西斯主义”，成了“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就生态马克思主义来说，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主张以限制“发展”来改善“环境”，建立“稳态的”（本·阿格尔）或“混合型”（戴维·佩珀）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幻想在“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依赖人的普遍愿望来实现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由此成了“一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几乎没有现实的可能性。

从实践层面上来看，在现实中，不存在相对于所有人而言的一般性生态问题，只存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生存和发展所面对的具体不同的生态问题。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生存和生活的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人对生态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差异的主体有着不一样的环境“想象”^[4]。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与地方“文化精神和人们的价值心理相契合，在对本土社会有更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增强在本土社会的应用性”^[5]。

当然，本土化不是自闭的特殊化，而是开放的现实化。本土化的本质与旨归就是现实化，是为了解决本民族、本地区现实存在的生态伦理困境与生态问题。一般认为，“现实化”主要是指本土的生态实际情况、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历史文化。其中，“生态实际情况”是基础因素，“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核心因素，“历史文化”是精神因素。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本土化，实际就是其与本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接的实践化。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找到生态文明建设与本土经济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性。

二、现时化：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历史定位

现时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一个历史定位，即生态文明建设立足现时并指向未来。这一定位的意义在于，只有立足于本土实际，才能反映并解决现时生态问题。只有反映并解决现时生态问题，才能对接并促进本土经济社会发展。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时代主题；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生态情况、不同的生态问题和相应的不同的历史任务。面对差异化情形，任何抽象的理论与固化的实践模式都将无力回应，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是发展的、具体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6]（P248）}。唯有如此，才能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P284）}从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现时化”是指生态文明建设沿着时间维度，朝向具体时代的当代化，其内在要求是反映时代生态文明精神、回答时代生态问题、引领生态文明建设，使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与本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对接。“对接”是生态文明建设紧扣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解决时代问题的基本途径；在“对接”中解答时代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现时化的关键环节。而时代的“实际”主要包括当今生态问题的新变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任务等。在“对接”的过程中，判断当今生态问题的新变化是基础，破解时代生态（伦理）问题是关键，引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是目的。这一逻辑理路和实现过程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现时化过程。

首先，判断当今生态问题的新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现时化的基础。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生态情形，蕴含着不同的生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与逻辑，并深刻影响着此历史阶段中的民族、国家、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本土化的进程中，只有对本土所处的生态情形及当今世界生态问题的新变化作出准确判断，抓住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矛盾与核心问题，才能成功开启生态文明建设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因此，科学地判断本土所处的生态情形及当今世界生态问题的新变化，是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基础或者说是起点。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将视线从抽象的“人类”转变到现实的人“类”，认识到现实中不同主体间的差异性，才不至于在高呼环保的同时，又无视发生在身边的由于“环境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群体的生态危机^[4]。

其次，破解时代生态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现时化的关键。每个历史阶段总有属于它自己的生态（伦理）问题，需要科学的理论去给予解答与回应。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进行考量，展开研究，完全是因为生态问题频频发生且日益严重。实现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关键，也就在于破解不同历史时

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难题；只有破解了难题，才谈得上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效度。在当代中国，新“公地悲剧”、“用户第一主义”的陷阱、“自然的社会建构”的限度、“越是‘绿’的地方越穷”、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承载限度等问题亟待破解^[7]。

最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生态文明建设现时化的目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时代的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生态文明建设现时化，需要不断对时代内容进行历史化开掘、现代化阐释与全球化整合，凝聚时代精华，实现自己本来的历史意义、可能转化出来的现代意义以及可能创生出的普遍价值，进而引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表现为：第一，引领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过去，国内外环境哲学（包括生态伦理）一直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中心主义”问题。究其根源，就在于自然中心主义以生物进化论和自然自组织论为依据，把人看成是自在的类；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理性为依据，把人看成是自为的类；二者都没有把人看成是对象性存在物，都没有把人看成是自觉的类。其引领作用之一，就是确立“无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即以人的非中心化为外在手段来实现人的中心化的内在目的，或者说，非中心化的工具价值作了目的化处理。第二，引领人们生产方式的转变。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文明形态的形成。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使人类迎来了“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濒临失衡的地球”和“环境荷尔蒙”。生态文明作为当今涉及生产方式变革的战略任务，其引领作用之二，就是确立生态化生产方式，发展生态产业。第三，引领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过去的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导致了资源的高浪费。因此，引领作用之三，就是确立生态化生活方式，即培养人们生态文明观念，倡导生态文化；引导人们文明消费，消除浪费性和污染性消费；拓展低消耗且对环境友好的精神消费领域等。思维方式生态化、生产方式生态化与生活方式生态化彼此关联，构成有机整体。我们需要以思维方式的生态化为先导，以生产方式的生态化为基础，以生活方式的生态化为牵引，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三、大众化：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主体要求

大众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一个主体要求，即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生态人。这一要求的意义在于，强调人民大众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只有本土群众内化并外化了生态文明观，形成生态人格，才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人民大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诉诸本土群众。这一主体性要求内含两个基本点：一是生态文明观既要掌握本土群众，也要被本土群众掌握，在满足本土群众需求中获得发展；二是推进本土群众人格的生态化，形成生态人格。前者是基础、是前提，后者是目的、是归宿。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6](P9)}因此，生态文明观只有掌握人民群众并同样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和应用，才能发挥和保持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才能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不过，生态文明观对于人民群众而言，是不具先验性的，必须将观念“灌输”给人民群众，使观念归依主体，才能在实践中沿着主体维度不断地从理论走向现实。生态文明观为何能归依人民群众且被践行？不单是因为语言表述从学术化走向生活化，逻辑演绎从理论化走向实践化；更因为它切实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说话”，才能为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接受、所践行。因此，大众化的实质是要实现生态文明观与人民群众利益的结合，这才是根本。

只有意识到理论观念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关系，才会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事业。当前，我们必须致力于对生态文明观进行持之以恒的宣传，既让人民群众掌握生态文明观，又让生态文明观掌握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参与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活动由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投入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生态文明观掌握群众”与“让群众掌握生态文明观”，是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生态文明观不仅要内化在人的思想观念中，更要外化在人的具体活动中。在这“内化—外化”过程中，推进了人格的生态化，培育了生态化人格，使人成为“生态人”。正如前文所述，“自然中心主义”者把人看作是自在的类，只见“生态”不见“人”；“人类中心主义”者把人看作是自为的类，只见“人”不见“生态”。我们

必须突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8](P360)}。只有“无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看到了“生态人”。

我们强调“无中心”,那是因为“无中心”,表现为人在实现自身中心化的同时要节制自己的中心化程度;我们强调“有中心”,那是因为“有中心”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使物趋近于人而不是相反。这样,促进人形成既享受生态权利又履行环保义务的生态化人格;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是善待人类、兼济自然的道德实践。

四、机制化: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实践支撑

机制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一个实践支撑,即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一整套实践机制。这一支撑的意义在于,只有具备本土特色的实践机制,才能解决本土生态困境。

过去,许多研究偏重于解释生态困境,而问题在于解决生态困境。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作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P57)}以往生态文明建设效度低,问题在于不从实践的立场并以历史性的眼光来理解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没有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机制。

其实,本土化践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实践机制是其内在机制与外在机制的统一,而在这两者中又包含着多种不同的构成要素,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系统。内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综合作用,影响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过程及其结果。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差异性建构理论和践行模式,正是这个整体系统中各个不同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实践机制就是践行主体、践行客体、践行主客关系的合理处置等各个方面所构成的有机系统,其中任一方面的不足,都可能导致具体践行活动的破产。具体包括:主体决策机制、系统运行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和自我发展机制四大类机制。这是问题的一般。

要使生态文明建设与本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接,就需要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外在实践机制,即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本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具体路径。这是问题的特殊。我们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应致力于,以彰显生态文化为导向(主要是思维方式生态化),以发展绿色经济为基础(主要是生产方式生态化),以鼓励适度消费为牵引(主要是消费方式生态化),以培育生态人格为归宿(人格生态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社会生态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外化;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与时间、空间在实践中有机统一。而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与时间、空间的统一性,决定了大众化、本土化、现时化与机制化的统一性。因此,场域规范、历史定位、主体要求与机制支撑统一于实践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必须以现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机制。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王韬洋. 有差异的主体与不一样的环境“想象”[J]. 哲学研究,2003,(3).
- [5] 李培超. 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建构的应有视域[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4).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叶平. 构建和谐社面临十大生态伦理问题[EB/OL]. <http://today.hit.edu.cn/articles/2005/08-09/08145117.htm>, 2005-08-09.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朱 蓓)